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战略视角

“一带一路”助力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 李敦瑞

在“一带一路”这一宏伟战略构想的推进中，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新的机遇。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入，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金融领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将持续增加，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也正日益高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在亚欧各国致力于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正成为以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的机遇

考察近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到去年年末，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十万亿美元的国家，进出口总量和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金融市场交易量、股市市值、吸引外资量和海外投资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声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为中国对外开放迎来了新机遇，也为人民币扩大在世界的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机遇。

其一，“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中亚等许多地区都是世界重要的能源输出地，而中国又是主要的能源消费市场，围绕国际能源贸易以及油气战略通道的建设，恰好为扩大人民币的国际支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其二，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8万亿美元，而中国正成长为世界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沿线国家的港口、铁路、公路、机场、通信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技术和装备，还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更多的人民币投融资服务。

其三，“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向外输出优质富余产能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和沿线国家企业进行对接势必产生更多的融资需求，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开放的债券市场、股权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完全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人民币业务服务。

其四，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以及正在推进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多和更为有效的平台。伴随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话语权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将与日俱增。

其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亚欧各国增加经贸往来，随着中国参与的各种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区协定的签订，各国扩大本币兑换和结算，在大大降低流通成本的同时，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和结算不断扩大。而且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被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包括人民币债券在内的各种人民币衍生产品不断出现，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不断得到发展。人民币甚至还将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央行的重要储备资产。

可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加快实施，海外对人民币需求必然持续扩张，人民币国际化将不再只是中国自身的需求，反而会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愿望和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

人民币国际化应摆脱“对抗性思维”束缚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失衡长期积累所引发的后果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日增。反映在货币金融领域，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都面临深刻的调整。人民币不断走向国际化，并在国际经贸领域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则是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经济紧密挂钩，借以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包括英、法、德、意、俄、印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纷纷申请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会员国，“一带一路”战略得到许多国家的呼应，恰恰说明人民币提高国际化程度，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着日趋强烈的海外需求。

然而，这并不代表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在当今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其一，迄今为止，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仍以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人民币尚不能如美元一样自由兑换和交易。其二，美元占国际储备货币组合比例在60%以上，全球主要央行和大多数国家仍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其三，建构在美元体系基础上的两大世界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在世界金融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美国仍在其中占绝对话语权。其四，美国相对实力虽有所下降，但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主要领域的实力仍雄居全球之冠，美国的话语权和主导力量仍在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可见，人民币与美元差距明显，运用“对抗性思维”挑战并取而代之并不现实。

从另一个侧面看，人民币的国际化乃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世界经济的“利好”，人民币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去挑战或取代某个国际储备货币。表面上看，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可能会挤压美元等其他货币的空间，削弱其影响力。但客观地说，这根源于主要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而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恰恰可以弥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代表性这样一种不足。这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并最终发挥中国经济影响力，以帮助世界经济真正实现复苏大有裨益。在货币问题上，应摆脱“对抗性思维”束缚，合作和互利才是主流。毕竟，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世界经济的福音，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终究也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在战略层面上有利于世界经济，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金融的稳定并不矛盾。

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助推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亚欧“命运共同体”，这也昭示着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的产生。这一模式以互惠互利为准则，推动亚欧各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寻求共同的利益，并致力于破除宗教、文化、制度、领土等问题上的分歧和障碍，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是这一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将超越以往任何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区域合作模式。

在这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下，亚欧各经济体可以加强货币流通，扩大主权货币的深度合作。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形势日益明朗，单极国际货币体系代表性差、国际协调难、关键国货币易超发等各种弊端不断显现。世界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更有利于各国货币政策协调、更具代表性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亚欧大陆及其邻近国家集中了世界六成左右的GDP和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拥有上海、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等世界知名金融中心，英镑、欧元、瑞士法郎、人民币也都是世界重要的货币。在“一带一路”这一极具包容性的国际大平台上，任何愿意合作的经济体，都可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参与到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中，以互惠互利为原则，携手打造“货币命运共同体”，发挥多种货币的协同作用，共同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贸易秩序，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以促进世界金融稳定。

从全球金融稳定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是“利益共同体”，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负有共同的责任。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只有让人民币更加开放，才能深化国际合作；只有让人民币更加稳定，才能为世界所接受。近年来，各种货币互换协议和清算协议的签订、资本市场开始的逐步对外开放、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都使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很大成效。未来，随着债券市场的放开、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将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一带一路”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将使人民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到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当中。并且，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相对稳定，也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使以互利合作为基准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拥有更坚实的基础，从而为世界经济走向繁荣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调研札记

教育要更好服务国家需要

——考察札记之七

□ 林振义

对芬兰、以色列、德国的基础教育考察，虽然走马观花，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没有了解清楚，但调研组一路走来一路讨论，感性加理性，经验加比较，认识深化了许多。

三国教育特点鲜明，各有所长。芬兰只有500万人口，实现了义务优质均衡教育，一下子把基本教育提高到优质教育水平。它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文化水平比较整齐，城乡基本生活差距不大，方方面面要素能够支撑得起这种教育特点。不过，投入毕竟太大，目前已出现财政难堪负担的情况。

以色列人口是芬兰的1.6倍，地盘不及芬兰的1/14，周边环境要比芬兰险恶得多。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求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教育必须能够培养出各领域的领军人才，以科技取胜，以创新取胜。英才教育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国家行动，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实施，没有太多社会阻力，这很不容易。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分流，那比德国分流更早一些。

早期分流是德国教育体制的核心。10岁看老，同年龄人口中近2/3的人小学毕业就注定要成为普通劳动者，并且绝大多数甘心成为普通劳动者。年轻人受过职业教育进入社会，为德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德国的综合性大学也在培养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人才。

看的是人家的情况，想的是自家的事情。一路走下来，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不同国家的教育理念不同，教育体制各异，但都基本上适合本国国情，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强力撑起了本国发展。那么，我国的教育怎么样呢？我与知名教育家唐校长聊起这个话题，交换了一些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已告别传统发展模式进入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大逻辑，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在决胜阶段，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在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任重道远。同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既有科技竞争又有治理竞争，根本的是人才竞争。教育干什么？教育就是要在现实国情基础上尽力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各个领域培养一流人才，创造新的发展动力，保证我们目标稳步实现，保证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强化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的导向，正当其时。我国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基本教育、优质教育、英才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教育改革应在这方面多有着力。这些年我们强调教育优先发展，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就巨大，但对三类教育的区分还不明晰，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英才教育更为薄弱。国外的基本教育就是教规矩规范、教生存技能、教创新精神，孩子到社会上能自立、讲诚信、重合作，我们这方面强调不够、行动不够。

由于实际存在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消除这些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期，要做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并不容易。你可以建起来光鲜的校舍，但教学设施跟不上，师资水平跟不上，想优质也优质不起来。国家应当着力保障基本教育，以优质教育标准来要求基本教育，把上海或北京的标准作为全国标准，实现起来有难度。德国和芬兰都由国家制定核心教学大纲，内容和规定非常宽泛，主要提出一些基本要求，各州各地区拥有比较大的教育自主权，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更高一些的目标要求。

研究教育问题，不考虑社会现实情况，不顾及国家经济实力，是做不成、做不好的。小班化、走班制是优质教育的重要标志，能实行起来当然好，但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在我国推开，一个是财力跟不上，另一个是师资跟不上。我们和芬兰的情况没法比，城市和农村、东部和中西部条件又都不一样。芬兰小学低年级基本上是全科教师，要求硕士以上学历。为什么？因为越是基本概念越不能出错，一个概念教错了，以后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纠正过来，所以他们很重视教师的业务水准，把教师视为研究性的职业。我们确定教育目标，师资因素不能不考虑。

我们的英才概念，似乎局限在科技英才上，对于国家治理英才、经济管理英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中学的各种竞赛班、大学的少年班，主要是培养科技英才。这当然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但要看到，国家治理英才、经济管理英才各有具体的能力和素质要求，与科技英才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搞的是单一的科技英才培养模式，认为科技好就一好百好，科技英才什么都能干好，这有误区。国外这方面的意识很明确。哈佛大学这样的美国名校招生，学业成绩很重要，但也很看重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和领导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社会责任感比较强，能够在社会各方面起到骨干作用。

培养国家治理英才，要紧的是确立民族自信。高中阶段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这个时候出国留学，成人之后的所思所想，都是外国那一套，就会与我们的社会产生疏离感。治理英才的培养应该立足我们国内，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从高中阶段着手来做。同时要着力培养经济管理英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是国有经济还是私营经济、混合经济都需要管理人才，尤其需要能够走出去搏击国际市场的高精尖的人才。

我国教育体系怎样才能更好服务国家需要，这是一个宏大主题，需要有关方面作深入研究。不过，这次芬兰、以色列、德国之行，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他山之石

美国公务员薪酬制度综览

□ 李志明　孟　聪

美国是联邦国家，联邦政府公务员和州、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工资管理是完全分开的。联邦公务员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制定工资制度和工资政策，并由专门的联邦工资账户支付；地方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并由本级政府财政负担。这里主要介绍联邦政府公务员薪酬制度。

分类管理是联邦政府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公务员分级法》，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本文主要涉及政府行政序列的公务员。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共分5个级别。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共分15级，每级又分10档，美国85%的公务员都属于这一类型。

以职位分类管理制度为基础，美国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务员薪酬体系。具体而言，它涉及三种类型：以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为主的公务员工资；以年休假、家庭与医疗休假、病假为主的公务员福利；以健康保险、集体人寿保险、养老金为主的公务员保险。

美国公务员工资

在美国，公务员工资由工资、津贴与补贴、奖金等几个部分组成。

其中，基本工资以常规工资体系为主、弹性工资体系为辅。一般职务（GS）工资序列是覆盖面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常规工资体系。按照工作任务、责任、任职资格条件等标准，可以将GS职位分为23职类、420职系、15职等、10职级。按照等内晋级幅度，可将GS职位序列分为单间隔等级序列（如GS-12，3/4/5/6）、双间隔等级序列（如GS-5，7/9/11）。GS职位序列的职等内增资适用于永久性职位雇员，职等内增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绩效能力应该达到基本要求，即绩效评定至少达到第三等次“良好”；二是达到规定的任职年限；三是在规定的任职年限内没有获得过其他增资。

弹性工资体系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在GS序列雇员发生再雇用、调任、重新安排工作、晋升、降级以及其他职位变动时，允许行政机构给予这些GS职位序列雇员高于常规工资标准的工资，但是必须遵守最高工资标准限额。二是联邦政府各行政机构在雇用具备高资格条件的申请者和特别需要的职位人员时，可以给予他们高于招募职位工资等级标准的工资。三是对联邦政府中的高级公务员、高层雇员、科学或专家职位雇员等高级雇员实行的具有宽带结构的弹性工资。联邦行政机构可以根据高级雇员所具有的资格条件和实际工作绩效，在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之间决定他们的年薪报酬。

美国公务员的津贴包括：普遍性的制服津贴，总数不得超过125美元；对派往联合国、波多黎各自由邦、运河区以及美国领地和属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公务员，给予临时住房津贴以及水电、煤气、燃料、取暖、采光、租金等生活津贴；给予派驻国外公务员以调任津贴、分居生活供养津贴、教育津贴和交通费等生活费津贴；根据环境给予驻国外地区工作雇员的岗位津贴，不得超过基本薪金的25%；危险津贴和其他津贴。美国公务员享有的补贴主要有：加班费、假期补助、购房补贴等形式。

联邦政府奖金包括：现金奖，金额一般不得超过1万美元，但是经人事管理署批准，可授予超过1万美元但不超过2.5万美元的现金奖；工作绩效奖，金额一般不得多于基本薪金的10%，也不得少于基本薪金的2%，但是经机关首长确认可以给予超过基本薪金10%、不超过20%的工作绩效奖。同时，为了吸引、安置和稳定优秀的公共管理人才，联邦政府推出了包括“雇佣奖金”“安置奖金”“留人津贴”等在内的奖励措施。

在美国，公务员工资的确定必须遵守四项指导原则：在同一地区，一定要不打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由于受到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公务员工资每年都会进行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但是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是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

美国公务员福利

美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包括年休假、家庭与医疗假，以及出庭假、骨髓与器官捐赠假、紧急事件假、应征入伍假和无工资假等。在这里，重点介绍年休假、家庭与医疗假。

年休假制度。联邦政府雇员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假期的长短与其服务期的长短紧密相关。普通公务员最长年休假不超过30天，高级公务员最长年休假不超过90天。未休假或未修满假的公务员可以依据未修的时间计算累积的补偿津贴。

家庭与医疗休假制度。联邦政府公务员的直系家庭成员因患癌症、心脏病等严重疾病，或因负重伤、怀孕或分娩等情形需要长期照顾时，可以申请最长12周的无薪假期。此外，联邦政府公务员每年可以获得不超过13天的病假，用以看病或照顾家庭成员和患病家属以及处理与收养有关的事宜。

美国公务员保险

美国联邦公务员保险主要健康保险、集体人寿保险以及养老金。

健康保险。由于美国没有普遍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联邦公务员的健康保险就属于公务员享受的正式的基本医疗保险，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住院和医疗费用保险；处方药保险；牙科、眼科保险；短期和长期失能保险；长期看护保险；意外险。加入健康保险计划后，个人依法支付25%医疗费用，并享受税收减免；联邦政府依法支付75%医疗费用。联邦政府公务员既可以自选医院、医生看病，也可以在指定医院由特定医生看病。

集体人寿保险。联邦公务员集体人寿保险计划是美国最大的人寿保险计划，包括基本人寿保险以及3个可选寿险计划。其中，基本人寿保险为强制性保险计划，所缴费用直接从联邦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中扣除。可选寿险计划包括定期寿险、万能寿险和终生寿险等形式。

养老金。养老金从性质上属于延期支付的薪资报酬形式。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养老金包括公务员退休金制度和联邦雇员退休金制度。其中，公务员退休金制度适用于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联邦政府雇员；联邦雇员退休金制度适用于1984年以来参加工作的联邦雇员。